

# 漢城「明清史研究方向的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林麗月\*

韓國明清史學會為紀念創立二十週年，於2003年11月14日至15日在漢城市成均館大學舉行「21世紀明清史研究方向的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者除了近百位韓國明清史研究者外，另有來自日本、大陸、台灣的學者共五人。筆者很榮幸應邀出席此一會議發表論文，參與討論，爰就此次研討會論文主題及其內容略作介紹，一隅之得，或可略見彼邦明清史學界之近況。

本次會議為期兩天，共有十篇論文發表，其中韓國學者五篇，中國大陸與日本學者各兩篇，台灣一篇。十篇論文依主題分三場發表，第四場為綜合討論。各場研討會論文講題、發表人、討論人如下：

## 第一場 明清時代的政治與國家

### (一) 〈洪武祭祀樂章與朱元璋〉

主講人：南炳文（中·南開大學）

討論人：李慶龍（韓·世宗大學）

### (二) 〈明清時代的鄉族與國家〉

主講人：鄭振滿（中·廈門大學）

討論人：李和承（韓·全北大學）

### (三) 〈戴震思想和清代國家理念〉

---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主講人：曹秉漢（韓·西江大學）

討論人：車惠媛（韓·延世大學）

## 第二場 明清時代的東北亞形勢與國家認識

### （一）〈明代滿蒙交替和遼東〉

主講人：盧基植（韓·高麗大學）

討論人：柳智元（韓·圓光大學）

### （二）〈清朝·朝鮮·對馬—1639年前後東北亞形勢〉

主講人：岩井茂樹（日·東京大學）

討論人：崔震奎（韓·朝鮮大學）

### （三）〈朝鮮中後期的儒教政治和《大學衍義補》〉

主講人：尹貞粉（韓·德成女子大學）

討論人：李允碩（韓·漢城大學）

### （四）〈「Post16世紀問題」和清朝〉

主講人：岸本美緒（日·東京大學）

討論人：元廷植（韓·江原大學）

## 第三場 明清時代的物流流通與生活風俗

### （一）〈明清時期廣東定期市的設立主體〉

主講人：朴基水（韓·成均館大學）

討論人：鄭哲雄（韓·明智大學）

### （二）〈太平天國時期四川食鹽在湖北、湖南市場的輸入與銀流通〉

主講人：李俊申（韓·仁荷大學）

討論人：閔京俊（韓·釜山大學）

### （三）〈晚明的消費與文化〉

主講人：林麗月（台·台灣師範大學）

討論人：金弘吉（韓·江陵大學）

## 第四場 綜合討論

主持人：吳金成（韓·漢城大學）

11月14日上午舉行的第一場研討會，主題為「明清時代的政治與國家」。首先由南炳文教授發表〈洪武祭祀樂章與朱元璋〉，南教授針對洪武年間十一類祭祀樂章的撰寫者和使用的時間、在各種文獻中的記載情況、難解字句的含義等詳加考證辨誤，並對明太祖親自撰寫祭祀樂章及其意義做了深入的分析。明太祖前後親自撰寫了五種樂章，即洪武八年的「祭地樂章」和「祭天樂章」、洪武十年的「合祭天地樂章」、始用於洪武七年的「祭祀歷代帝王樂章」，以及完稿於洪武十年的「合祭太社太稷樂章」。文中並指出，朱元璋出身貧賤，使他比其他帝王更需要透過祭祀活動以鞏固皇位，他的重視祭祀樂章並親自撰寫，與其特重實現祭祀活動的「神道設教」目的有密切關係。

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新一代的歷史學者，逐漸擺脫「五個發展階段」理論的束縛，開始深入探討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脈絡，因此，鄉族不再被視為阻礙歷史進步的殘餘，而是而被視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獨特表現形式。鄭振滿〈明清時代的鄉族與國家〉介紹了廈門大學明清史前輩傅衣凌教授的「鄉族」理論之要旨及近年來鄉族研究的發展。文中指出，自明中葉至清後期，由於地方政府職能的日益萎縮，社會控制權不斷下移，所以明代中葉以後的政治體制，可以說以鄉族自治為特徵，也可說是「國家內在於鄉族」。

第三篇論文是韓國西江大學曹秉漢教授發表的〈戴震思想和清代國家意識〉，探討戴震反程朱學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及其歷史意義，文中指出，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對程朱學的批判與當時一般考證學界的批判在理論深度和改革上有很大的差異，而「以理殺人」命題的出現，則顯示其與程朱學的完全決裂。戴震從經世思想的民本主義出發，肯定民利與情欲，與其說反映了資本主義的趨向，不如說是一種抵抗，也是反映時代變化的儒家士大夫的道德重建運動。

下午進行的第二場研討會共有四篇論文，以「明清時代的東北亞形勢與國家認識」為共同主題。高麗大學盧基植教授發表〈明代滿蒙交替和遼東〉從元明交替到明清交替的過程看蒙古與滿洲地位的消長，探討遼東在蒙滿關係變化及其在近代東亞國家秩序變動中的角色。文中指出，蒙滿關係的消長是對明朝經濟關係的分離和統合的過程。明清之

際，滿洲利用蒙古的混亂，在長城地區成功地取得蒙古對明貿易的經濟利益，從而創造了進入關內的優勢，並在政治上促使後金體制向大清體制轉化。

第二篇論文是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岩井茂樹教授的〈清朝・朝鮮・對馬—1639年前後東北亞形勢〉，該文從清朝內閣大庫檔案中僅有的兩件日本文書「寬永十六己卯歲倭書」及「寬永十六己卯歲倭書禮單」探討1639年前後東北亞的形勢。這兩件文書是寬永十六年（1639）對馬藩主宗義成寄朝鮮國禮曹參議的書契和開列禮品的附錄。岩井教授指出，1630年代，日本江戶幕府的領導高層十分崇尚以武力威脅來解決問題，1637年以後，清廷要求朝鮮派兵參加征明作戰，朝鮮為緩和清廷要脅之急，經常強調日本的威脅。在1636年八月釜山倭館的交涉中，透過譯官洪喜男和對馬「裁判」有田埜兵衛的折衝，特別強調兩國跨地域與語言的共同利益，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環境中逐漸開啓東北亞經貿關係的新時代。

第三篇論文是德成女子大學尹貞粉教授的〈朝鮮中後期的儒教政治和《大學衍義補》——關於朝鮮的經筵和政局推移〉，尹教授透過《大學衍義補》的傳入，考察朝鮮中後期的政局變化，並就朝鮮王朝經筵教材的變遷過程，尤其是有關《衍義補》選為經筵教材引起的中宗時期（1506-1544）正反論戰的意義進行剖析。值得注意的是，該文透過朝鮮正祖時期（1777-1800）刊行的《大學類義》和原本《大學衍義補》內容差異的比較，指出前者呈現出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觀，意欲實現「朝鮮中華主義」的自主性立場，並在此基礎上，致力於朝鮮固有文化的創造，顯示以南明滅亡為關鍵，牽動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變化。

第四篇論文是日本東京大學岸本美緒教授發表的〈「Post16世紀問題」和清朝〉。該文所謂「Post16世紀問題」係指17世紀陸續建立的「近代國家」面臨的幾個共同問題，如民族宗教問題、社會編制問題、市場經濟和財政問題等。岸本教授將清朝置於世界史中的一個「近代國家」中考察，並透過同時期日本、朝鮮的比較，探討明清交替的意義及清代國家的特徵。文中指出，把中國、韓國、日本等國歷史視為相互連貫的整體而不以「一國史」（國別史）為框架的「東亞地區論」，是十餘年

來日本歷史學界的研究主流。過去日本的清史學者分屬兩個陣營：一是主要利用中文史料、以「中國史」為範疇的研究者，一是運用滿文史料、以「滿洲史」為範疇的研究者，「東亞地區論」則超越上述界線，強調問題的關鍵不在「中國」與「滿洲」的互相對立，而是在多民族匯聚的明末邊境地帶興起的「邊境人」，充分利用了「中國式」與「內陸亞洲式」的戰略資源，從而實現了清朝兩百多年的統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岸本教授的討論中，提到了近年來美國學者Mark Elliot和Pamera Crossley有關滿人文化認同的研究，<sup>1</sup>認為此一研究動向實與日本「東亞地區論」對中國中心主義的批判不謀而合。文中指出，被視為「夷狄」的滿洲人入主中國以後，導致整個東亞地區的華夷觀更趨多元化，這種多元化具有多重意義：一、「華」不再為中國或漢族所專有，在東亞許多地區因此衍生出「『華』的子意識」。二、「華」與「夷」的區別也產生不同的型態，一方面華夷之分開展出「機能化概念」，亦即所謂「華」不是中國地理性的地區或漢人所專有，而是任何地區、任何民族只要具備合適的條件都可以成為「華」，因此「華」帶有普遍主義的立場。另一方面，也有與重視「文」與「禮」的中華意識相對應的，以主張「武」和樸素而構成民族整體性的主張，如日本的「武威」或神國意識等。清廷則是一方面在儒家的普遍主義倫理中對漢族知識份子宣揚其政權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則不放棄強調尚武及質樸的「滿洲之道」，可以說是機能概念的華夷觀一個最極端的典型。岸本教授認為，清朝所面臨的問題，可能也是在十六世紀的混亂中出現的東亞、東南亞或包括歐洲在內的新興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諸如：對國內不同族群和各種宗教要以怎樣的意識型態進行整合？如何將十六世紀變動中形成的社會集團加以制度化以安定秩序？在吸收廣大的市場經濟利益的同時，又應如何重新建立經濟秩序？清朝與朝鮮、德川日本對「後16世紀問題」各自尋求的解答儘管不同，但對當前的現代社會還有一定的影響並形成

---

1 詳見Mark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amera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傳統」。

11月15日（星期六）上午進行的第三場研討會，主題是「明清時代的物流流通和生活風俗」。首先由成均館大學朴基水教授發表〈明清時期廣東定期市的設立主體〉，這篇論文主要透過廣東地方志中墟市的相關記載，討論主導明清時代市場的設立和營運的階層或勢力，文中統計明清廣東有設立者可考的125個墟市中，由地方官設立的有43個，紳士18個，宗族45個，個人7個，鄉12個。廣東由地方官開設的墟市雖然不少，但主要集中於康熙年間，到清代末期逐漸減少。另一方面，透過宗族開設的墟市，則主要集中於廣州府等宗族發達的地區，且集中於宗族快速發展的清代後期。朴文強調，這個研究顯示國家權力對地方經濟的影響力自康熙以後逐漸下降，而填補這一空白的則是伴隨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而興起的紳士和宗族。

第二篇是韓國仁荷大學李俊甲教授主講的〈太平天國時期四川食鹽在湖北、湖南市場的輸入與銀流通〉，該文透過清廷因應太平軍亂事自咸豐三年（1853）至光緒二年（1876）實施的「川鹽濟楚」政策，考察四川鹽業的成長及其帶來的地域社會變化與白銀流通。文中指出，因「川鹽濟楚」政策的實施，四川四大鹽商家族——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嚴桂馨堂，透過技術開發與多角化經營、與官紳的交遊、捐納等內外因素而得到快速的發展。他們由川鹽濟楚獲得的白銀以多種型態流通於市場，其中典當業的經營更對清初以來一直掌控四川金融業的陝商構成威脅。這些鹽商的主要活動集中於自流井與貢井，清末，自流井與貢井發展成「鹽都」，四大鹽商家族在其都市化的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後一篇論文是筆者報告的〈晚明的消費與文化〉。主要是從消費觀念與消費行為兩個層面觀察晚明社會文化的變遷及其歷史意義。明代社會風尚的由儉而奢，既有量的增加，也有質的提升，衣、食、住、行、婚喪禮俗各方面的華侈相高，不僅對國家禮制設定的等級秩序構成挑戰，也開啓了晚明社會文化的幾個新面向，其一是消費能力提高與身份象徵的日益模糊，晚明士庶「貧作富態，富作貴態」的民情風習，更促使商人在財富力量可以模糊身分符號的風尚中「用富求貴」。其次是平

民消費心態的轉變：晚明奢風所及，庶人不僅重視門面，而且重視享受、捨得花費，江南一帶城市尤盛行「即掙即花」、「不以儲蓄為意」的生活態度，顯見晚明城鎮居民已有「不僅要消費得更多，而且要享受得更好」的消費心態。再者，則是士人消費思想的轉變。明代中期以後，有些士人不僅贊成多流通（商業），而且贊成多消費（奢侈）。嘉靖年間上海士人陸楫撰〈禁奢辨〉，透過同時及其後著作的轉抄，其「崇奢」論在晚明至盛清的士人之間流行，並與「保富」觀念並轡而行，有其「惠商安民」內在思想之聯繫，是明清經濟思想史中「傳統內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的極佳例證。

此外，晚明消費文化的變遷，更表現在「雅俗之分」的品味競賽上。明末蘇州文士尤以其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本，強調生活消費的文士品味，如蘇樣服飾以高冠大袖、長至腳面的寬袍，急行就會脫落的淺面低跟絲鞋，展現文人雅士不事生產、從容不迫的閒暇意味，形成以蘇州文士為核心、由財富與市場帶動的品味競賽，亦即一方是擁有文化資本的蘇州文士，一方則是擁有財富與市場的商人，彼此互通有無，各取所需。明末「蘇人以爲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即是這種士商既競爭又合作的消費文化的反映。由此觀之，「貧作富態，富作貴態」固可說是晚明奢侈消費的寫照，但「富未必雅，貧未必俗」的雅俗分化，或許才是晚明社會文化最具特色的「變革」；對探討十六、十七世紀社會的連續或斷裂問題，消費文化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剖面。

本次大會最後一場研討會，是11月15日下午舉行的綜合討論。主持人吳金成教授針對會議主題「明清史研究方向的新探索」，總結此次會議的成果及未來努力方向如下：一、基本史料的發掘與深讀。二、政治外交史的研究仍應繼續進行並予深化。三、社會下層的研究有待關注。四、總結明清的歷史經驗以爲今人借鏡。五、加強國際交流，推動研究合作。

整體而言，本次會議的研究課題，以明清時代的東亞互動最受關注，政治史、經濟史次之，社會文化史的討論又次之，誠如吳金成教授所言，韓國明清社會下層生活的研究迄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此與臺灣近年來明清文化史與生活史的研究蔚爲風氣似成對比。另一方面，日、韓

學者比較重視明清時期中國、朝鮮、日本的互動，以及中國中心的「東亞秩序」的變化等問題，相形之下，兩岸學者仍以將明清放在「中國史」的架構中考察者為主，如何從「東亞地區史」的範疇探討明清時期中國與其周邊社會文化的變遷，應是可以拓展的研究方向，值得此間學友借鏡參考。